

# 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国民教育发展概述

## ——以“第三代国民教育说”为例

◎陈佩云

**摘要:** 1960年代后期,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声势浩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旨在宣扬三民主义并自命为中华文化的道统传承者。为了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发展三民主义建设,以教育为本,极力倡导青少年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以望其成为复兴中华的斗士,为“光复”大陆冲锋陷阵。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萧瑜远在乌拉圭,他提出“第三代国民教育”的说法,将当时的台湾小学生视为第三代国民,主张重视第三代国民教育。本文根据这一说法,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的台湾国民教育进行梳理。

**关键词:** 台湾;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国民教育 “第三代国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562(2019)01-0029-07

近现代以来,教育成为国家事业,肩负着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谐、文化繁荣的任务,国民教育的成败,甚至左右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如何积极促进国民的教育发展,成为政党建设国家的要务。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101岁诞辰纪念与台北阳明山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典礼上,蒋介石发表《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表明“国父三民主义之思想,不惟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汇归;而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乃益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保卫者也!”<sup>[1]</sup>论证了三民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勉励国人庄敬自强,坚定光复大陆的信念。随后,孙科、王云

五等人倡议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被台湾“行政院”所接纳,并设定每年11月12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隔年7月28日,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发起人暨成立大会,确定了运动推行纲要与推行委员会组织章程,正式由运动过渡到委员会。轰轰烈烈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就此揭开帷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与方面,借由演讲、媒体报道、展览、作文比赛等各种方式,影响到台湾的各个角落。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要负责的工作包括:“弘扬伦理道德、推展科学研究、学术研究出版、教育改革促进、文艺研究促进、倡导标准行书、

收稿日期: 2018-12-10

作者简介: 陈佩云,女,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福建 厦门,361005。

推广梅花运动、进行弘扬国粹及传统他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以及文化向下扎根等工作，均经加强实施”<sup>②</sup>。

1960年代台湾的教育宗旨，仍然延续着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所提出的“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世界大同。”<sup>③</sup>蒋介石重视国民教育，将其视为“复国建国之根本”、“建设现代社会，与复兴民族文化之张本”。并且继续去除“日本化”的遗留，加强中国化教育，强调精神训练，培养国民意识与“爱国”精神。

学界关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台湾的国民教育均有诸多论述。前者如施志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研究》与林果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之研究（1966-1975）》等。台湾国民教育的研究则主要着眼于光复后、战后初期与二十世纪末三个时期，对于六七十年代的专门研究较少。本文借“第三代国民教育”的说法，探讨19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之间台湾的国民教育。

### 一、第三代国民教育的概念厘定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为加强对台控制，极力宣传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思想，推展各项文化运动，积极推进台湾的“中国化”与“民族化”，国民党以台湾作为反攻大陆、传承中华文化的基地，以此寻求确立统治的正当性，蒋介石退居台湾后，常常宣称“今日复兴基地之台湾省，实为汇集我中华文物精华唯一之宝库；且又为发扬我中华民族文化使民富且寿之范式！”<sup>④</sup>1934年国民党在江西南昌推行“新生活运动”，此运动随着国民党的颓势愈重，最后草草收场。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仍走这样的路子，例如1952年的“文化改造运动”、1954年的“文化清洁运动”、1955年的“战斗文艺运动”等，试图通过开展文化运动、政治运动，改造国民思想，净化岛内风气，反共抗俄。为了使台湾当局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地位不动摇，与大陆“文化大革命”抗衡，以彰显自身是传统中华文化的唯一的、真正的、正义的接班人。

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萧瑜，在中华文化运动开始不久后，即于1968年4月8日，自乌拉圭寄给蒋介石一封信，表达他对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意见。他提出“第三代国民教育”的概念，即“我将如何加以收拾，如何‘洗脑’、‘换骨’重加教育，此一工作较之陆海空军中作战，更为长期艰苦，其时我方相与搏斗者正为我国今日在台之第二代国民。我国今日五六十岁以上之人，及大中学尚在中年之教师，实为国民之第一代，大中学生为第二代，第三代国民则今日之小学生也。”<sup>⑤</sup>萧瑜将当时的大中学生看作是第二代国民，反攻大陆时冲锋陷阵、摇旗呐喊的战士，将当时的小学生作为战斗种子。第三代国民因其年纪尚小，所以具有如此特质“其秉赋性最纯洁，心最热烈，道义之根，理智之芽，皆郁郁勃勃，待时而发，躯体心灵，皆富生气，日益向上，皆天真烂漫，前程似锦之天使也，加以特别之教练，即收特别之功效。”<sup>⑥</sup>因此，第三代国民乃是文复运动的根本之基，有此基层与健全组织核心，与大中学生教育相配合，长期发展科学，教授中华文化，便能促进全面作战的完成。而第三代国民的“洗脑”与“换骨”教育比荷枪实弹的海陆空军中战斗更为艰难，对其教育也显得尤为重要，他认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必特别注重于第三代国民教育，及对外文化输出。”<sup>⑦</sup>必须着重于这两点开展运动，才能达到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

第三代国民教育，包含着政治功利的需要，是为反攻大陆目的服务的。自1949年败退台湾，国民党一直以光复大陆为目标。因此，第三代国民教育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与斗争性质，“故文复运动之根本精神，原有抢救国家民族命脉，而有战斗之性质也。”<sup>⑧</sup>萧瑜认为，因“文化大革命”发生，所以国民党“复国建国”更难，中华文化是台湾这座孤岛与“中国”的重要纽带，中华传统文化既然在大陆受到破坏，退居台湾的炎黄子孙便必须奋起加以挽救，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在台湾扎根生存。蒋介石的原意在于将台湾打成一个三民主义建设的模范省，“中华民国”的国民必须时刻准备着战斗，为抢救、保存中华文化不遗余力。

同时，规划光复大陆后对民众之再教育，也是第三代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将台湾的第三代国民教育得当，才能在国民党当局重返大陆后，为文复会临阵作战，第一代国民可为指挥及队长，第二代国民上战场直面敌军，这样的作战或许会持续十八年至二十年，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sup>[9]</sup>，这一典故出自《左传》，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带领越国军民同仇敌忾，奋力抵抗，大败吴军。用十年的时间繁殖人口，聚积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作战教育训练。而文化之战，则是更为长远的事情，推行教书育人是国家政党的百年大计。恐怕必须要持续五十年乃至一百年，第一代与第二代国民终究年纪渐长，而第三代国民则成长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最后，复兴中华文化的重任唯有落在第三代国民身上，第三代国民教育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中华文化的前途。第三代国民几乎都是在台湾出生，对祖国大陆几无印象，对中华传统文化所知甚少，必须由国民党当局加以训练，重视针对第三代国民的教育，才能激发他们“爱国”爱民族、弘扬传统文化的热忱，进而担任起复兴的大任。

为培育第三代国民为真正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革命战士，尤其要注重小学教育，正所谓“小学之功，大学之基”。萧瑜提出两点措施，一、加大力度推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特别厘定小学课程，改编小学课本，在之前的德智体群教育的基础上尤其加强文化教育，接受复兴中华文化的预备教育和作战训练。小学毕业考试与升学考试应增加文复学习一门。二、用特种方式训练小学老师，充实小学学校设备，提高小学老师的待遇，参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政府将小学教师薪资提高一倍的做法。仿照大学的做法，“总统”应宴集小学教师、设立小学教师奖励金、举办文化复兴运动教学比赛。此外，萧瑜以“反共救国”青年团、幼狮社等组织不力，说明没有侧重发动小学教育的不足。

## 二、“第三代国民教育”的构想

根据《中华文化运动推行纲要》的推行要项第一条“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教育为重要推行部门，应由各级教育主管机关对教材师资及社会教育，尤其国民体育、德育、群育之设施与推行

加以检讨改进，订定办法，积极实施。”<sup>[10]</sup>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设立了五个机构，分别是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学术研究促进出版委员会、教育改革促进委员会、基金委员会。其中教育改革促进委员会以阎振兴为召集人，大致负责以下五项内容：第一，教材教师师资情况之检讨与改进，并于各公私立大学设立文化讲座，以阐扬我国文化；第二，收复大陆后对大陆民众再教育之规划，并鼓励国人投资教育文化事业，促进社会公益；第三，会同地方政府，整修及兴建体育场公园社教馆及音乐、舞蹈、戏剧等演出场所，并扩建教育广播电台、电视台，建立全省转播网，以有效实施电视广播教学；第四，比照国内推行办法，辅助侨教之改进，斟酌当地环境，积极予以协助实施；第五，外国大学中国语文范本之调查及编印<sup>[11]</sup>。

教育部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的重要推行部门，由各级教育机关主管“订定办法，透过各级学校，并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密切配合，积极推行。”<sup>[12]</sup> 教育改革促进委员会负责教育改革的研究、设计、指导和促进等事宜。此会设置主任委员一人，由总会遴选；研究委员若干人，由主任委员依照实际需要报总会聘请；执行秘书一人，协助主任委员综理会务；执行秘书下设干事三人，分管联络、公文处理与文书缮发等。依照工作性质，教育改革促进委员会分为六个小组：第一小组：教育制度课程改进之研究；第二小组：科学教育之研究；第三小组：生活教育之研究；第四小组：体育健康教育之研究；第五小组：语文教育之研究；第六小组：侨民教育之研究<sup>[13]</sup>。

其中，萧瑜借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战胜法国、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与英国政府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做法，表明重视小学教育的正确性。九年国民教育的推广就是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背景下。九年国民教育，由六年延长至九年，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是革新教育的重要举措。“至望教育部于此作始之际，能根据三民主义——伦理、民主、科学的教育思想，彻底检讨自民国以来之教育政策、教育制度与教育设施，以‘另起炉灶’、‘重整河山’之精神，殚精竭虑，从头作

起,使今后之教育,成为生动活泼的教育,并彼此能新能行之教育,成为一切知耻知病、求新求行之张本。”<sup>[14]</sup>台湾的义务教育制度延长至九年,除了学习三民主义、教育青少年成为庄敬自强的国民外,还以伦理、民主、科学为重,希望青年为现代化做出贡献。“总之,九年国民教育制,以养成民族伦理与固有文化——即四维八德之习尚,以及初级历史地理之常识,务使其能了解现代国民对国家社会应尽之义务与责任,不失为爱国爱民、堂堂正正之现代国民为教育方针。”<sup>[15]</sup>

针对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小学生所开展的第三代国民教育,萧瑜提出四个推行办法:第一,加强小学有关“中华文化”的课程,及早加以教育,激发其爱护固有中华文化的热忱,使其担负起复兴的大任,培育其成为斗士,教其作战;第二,拟定长期发展小学教育计划,充实小学设备,训练小学教师,提高其待遇,仿照宴请资深大学教授之例,每年赐宴资深中小学教师,召见绩优资深小学教师。设立小学教师奖学金,予以鼓励;第三,举办文化复兴运动学习比赛,在小学学年考试、毕业考试及升学考试,均宜加考文化复兴课程一门,借以提高其对中华文化课程的重视;第四,将“全国”小学生皆纳入童子军组织接受改造,加以培养,使人人从小得到军事训练,日后可胜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战斗,构成基层与核心的健全组织,然后与大学青年教育与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相互配合、相得益彰。<sup>[16]</sup>

### 三、民族精神教育的实施

从1969年开始,为配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开展,台湾“教育部”每年颁布下一年的加强民族精神教育计划,如《修正戡乱时期高中以上学校学生精神军事体格及技能训练办法》与《五十九年度加强民族精神教育计划》。

1971年十一月十九日,“教育部”公布《民族精神教育实施方案》,包括原则、办法、考核等项,通令各学校加以实施。方案在前言中指出“复兴国家的教育,以发扬民族精神为根本。民族精神是立国的精神,也就是国魂。民族精神在教育中生根,屹立不摇,才能使全国人民深知体认‘四维’、‘八德’之真谛,从而培养笃实践履之优秀国民,成为堂堂正正、忠勇爱国的中国

人。以国家的国魂为自己的灵魂,以民族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奋发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后的胜利。”本方案揭示了民族精神教育的六项原则:一、复兴中华文化,整理民族遗产,继承光荣历史,以培养庄敬自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二、加强民族意识,融合民族情感,坚定民族意志,以发挥团结一致与坚忍不拔的民族力量。三、发扬固有道德,使四维八德生活化、行动化、社会化,以巩固民族精神的基础。并培养民主气质,使社会暴戾凶残之恶习消弭于无形。四、恢复民族固有的智能,以穷理致知,培育研究精神,迎头赶上欧美科学。五、确立“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五大信念,养成积极奋发、勇敢牺牲之战斗精神。六、明耻教学,发愤图强,以光大砥砺雪耻的民族气节。实施教育必须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密切配合。针对国民小学学生,要注意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习惯,加强伦理教育与国语教学,提升学校环境,充实教学设备,增加团体活动,参观科学馆、艺术馆、博物馆等。针对国民中学学生,应以公民教育、道德教育与职业教育为主,尤其加强童子军训练,养成忠勇“爱国”、乐于助人的健全国民品格。另外,针对高中、大专院校与师范教育均有专门说明。

1975年五月六日,台湾省政府则颁布《台湾省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实施方案》<sup>[17]</sup>。实施重点包含:一、加强“反共爱国”教育;二、加强推行中华文化复兴;三、加强生活教育;四、加强时事教育;五、加强推行小康计划。第五点具体阐述为“转移‘自我中心’的观念,培养仁爱、互助、推己及人的精神,养成服务国家社会的人生观”。台湾经历了1971年退出联合国、保钓运动、台日断交、中美关系改善等一系列的外交挫败之后,“台湾自决”的呼声高涨,反攻大陆基本无望。此时的国民教育,则更为注重现代性的培养与台湾社会经济的自身发展。

### 四、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期间台湾国民教育的价值取向

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继续实行“动员戡乱”体制,蒋介石领导国民党一心致力于“反攻”大陆,因此,国民教育是为培养庄敬自强的

民族自信心、“复国”雪耻的民族气节，呈现出明显的政治色彩与战斗特征。针对自小生长在台湾、缺乏大陆与“中国”知识的第三代国民，教育上强调“民族化”与“再中国化”，学校成为了运动重要的前线；改进教育制度，向西方国家学习，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中西合璧，文化交融，国民教育向现代化迈进。

#### （一）政治性导向：民族精神教育

蒋介石屡屡陈述自身“重光”大陆的信念：“隔水西望，满目疮痍，渡头落日，青山一发者，莫非中原，泪枯血干，死生无告者，莫非吾胞与骨肉焉！是以中正难经艰难险阻，与侮辱横逆之来，犹予日孳孳，而忘其身之老，责之重也。”<sup>[18]</sup>面对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蒋介石标榜国民党的道统地位，暗含着上承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圣圣相传之道统，再由孙中山传给蒋介石。蒋介石将台湾作为实行三民主义建设复兴基地，与大陆抗衡，打着传承、抢救、保卫、复兴中华文化的旗号，最终的诉求乃是“反攻复国”，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与时代性。运动的政治性主要包含“反共复国”、“国家至上”、领袖崇拜。

蒋介石多次在公开场合阐述文化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文化建设为一切建设的源头，而文化战又是总体战的前卫。文化建设有深远的渊源，文化作战才有锐利的锋镝，其贯通二者之间，以厚植其基础，而激发其光芒者，乃是中华文化的全体大用。”<sup>[19]</sup>这种论调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领导者的文章中屡见不鲜，“但我们如不急起努力，从事复兴文化的工作，亦将延长其统治，使全国人民益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无以自拔”<sup>[20]</sup>，“国父诞辰同时为中华文化复兴节，使世界认识瞭然于我文化正统之所在，亦所以鼓励海内外敌前敌后军民同胞保卫我历史文化之英勇奋斗”<sup>[21]</sup>。在文化复兴运动中特别有《改进本党组织适应战斗需要案》，其中指明运动应该充分发挥基层的力量“为适应战斗之需要，动员组织达成特种任务，应订定地区党部授权办法，以发挥统合力量之功效。”<sup>[22]</sup>为了加强基层人民的战斗技能训练，为此预备了经费以便于基层工作的开展。教育青年一代，中华文

化复兴运动要“借我们传统的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的理性与良知，以建立起反抗斗争真正坚强和必需的心理基础”<sup>[23]</sup>。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时期的国民教育，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教育内容的选择。在教材方面，全面检讨民族精神教育、品德教育、生活教育与忠孝教育，调整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史、地、公民与“国父思想”等课程。正如文复会认为的那样“此次文化复兴运动，将与反攻复国以及建国运动相始终，其有关于国运前途及我中华新文化之建立者，至深且钜。”<sup>[24]</sup>教育改革的推展，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目的是使知识与道德融会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培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道德，爱好科学之品质，使国民笃信三民主义并身体力行。蒋介石对青少年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彼时台湾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经济加速发展，但是社会风气、国民道德却不甚理想“各位少年子弟于今日完成国民教育阶段的学业，当感于自身职责的重大，在学校要做一个明礼尚义、活活泼泼的学生，在社会要做一个自立自强、堂堂正正的国民，发挥潜力潜能，贡献国家社会，以从事建设为己任，以转移风气为己任。”<sup>[25]</sup>在小学的国文课本中，有诸多关于蒋介石的课文，塑造偶像崇拜，如《爱国的蒋总统》、《忠勇的蒋总统》、《蒋总统小的时候》、《勤劳的蒋总统》、《努力向上》、《伟大的蒋总统》等。这对于小学生的价值观有塑造作用，并使之建立起对祖国、民族的热爱与对领袖楷模的崇拜之情。

#### （二）传统性导向：主张“再中国化”

日本殖民台湾五十余年，在台湾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二战结束后，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面对一个百废待兴并且受日本文化影响极深的领土，当局陆续推行了许多重塑、强化中华传统文化的政策措施，极力消除“日本化”，而“再中国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时期国民教育的开展，是这一思想的延续。

在国民教育上，为“陶冶民族人格以利反攻复国大业的进行”<sup>[26]</sup>，首先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与民族精神，加强“国父思想”教学增加“本国”史地教学，强化大中国意识，强调台湾与中国的历

史渊源，重塑、深化台湾人民对中国的记忆和情感。推行《国民生活须知》，规范学生生活与礼仪，举办展览、竞赛、作文等活动，大力加以宣传；发扬民族音乐、“爱国”音乐，举办“爱国”歌曲比赛，以艺术为载体，熏陶学生思想；建立各级学校训导师制度，对学生的思想动态加以掌控，及时排除违反民族精神的心理倾向；规定并组织学生参观历史名胜古迹。

在学校范围内，继续大力推行国语运动，“以沟通国民思想，增进情感”<sup>[27]</sup>。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台湾以日语为主，国民党的政令难以施行。在光复初期，便开始了国语运动。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浪潮下，国民党再一次强化国语教育和学习。国语成为大中小学的教学语言，文化复兴运动时期，国语运动已经开展十余年，台湾小学生的国语水平大幅提高，台湾地区实现了国语的普及，奠定了民族统一的基础。

在民俗艺术推行中，可谓事无巨细。民俗艺术包罗甚广，鉴于实际情况，决定推行春联、剪纸、元宵制花灯、端午制香包、重阳登高吟诗会、放风筝、捏面人、中国结绳、泥塑、木偶雕刻、京韵大鼓、说相声、说书、皮影戏、傀儡戏、布袋戏、跳绳、踢毽子、打陀螺等。在推行方法上，令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所属地方分支机构辅导各国民中、小学校支会学生，利用美术劳作课程制作花灯、香包、风筝、剪纸、春联等民俗艺术，并配合节令，举办有关研习会、观摩会、展览会、表演会及竞赛等活动。<sup>[28]</sup>通过学习国画、武术、围棋等，着力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

以四维八德为基础，提倡儒家文化，主张国民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家庭为中国文化之基石，对于家庭教育与孝悌之道，尤应特加注意倡导实践。”<sup>[29]</sup>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思想，笃行实践，树立优良家风，从而导正社会风气。家庭教育的具体实施包括：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培养道德品质良好的子女；培养子女勤俭朴实的习惯，使其奋力自强；发扬和邻里和睦相处、互助互利的精神，促进人际关系等。以家庭为单位，提倡纲常伦理道德有助于端正社会风

气，维护社会稳定秩序。

国民教育的推行，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始，到国语的普及与使用、传统文化的吸收与实践，使得台湾人对大陆产生一种“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感，构成了日后两岸开放交流的基础。尤其在社会结构与价值观日趋变化，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台湾社会、风气逐渐败坏、传统道德价值观濒临崩溃的时候，国民党大力推行的国民教育使得中华文化真正在台湾生根发芽。

### （三）现代性导向：合格公民修养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纲要》中明确指出：“积极推行新生活运动，使国民生活在固有文化四维八德之熏陶下，走向现代化与合理化。”<sup>[30]</sup>随着社会的转型，教育势必发生重大的改革与发展。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的助推下，台湾的国民教育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文化复兴运动既不是文化复古运动，那么，我们就要不仅能够守经如常，还要能够创新应变。”<sup>[31]</sup>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时期的国民教育，旨在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时代的急剧变化，要求教育上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

首先，教育要求新求行，要成为“活的教育”而非“静态的教育”，因“盖有能新能行——日新又新、实践笃行——之教育，而后始有能新能行之政治，与能新能行之社会与国家。”<sup>[32]</sup>中华文化与现代西方学术思想融合发展，摄取西方文化的精华，促进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

其次，改进教育制度，完善教学体系，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提倡职业教育，辅导中学生就业。1968年台湾施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国民基本教育的延长，不仅是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与扩充，更是整个教育重建与革新的起点。在小学教育中，全面增设科学学科。1970年，台湾“教育部”派遣小学科学教育考察团赴美国与日本考察，1972年7月正式成立“国民小学科学教育实验研究指导委员会”，积极改进国民小学的科学教育。

再次，在师资方面给予大量的投入。教育以建立师资为首要。蒋介石认为，教育之关键在于师长为人楷模，以身作则，修己崇德，为学生所

敬畏。掌握优良的教学方法，实学实用，启发学生的潜能，使其明理义知廉耻，自觉自爱，学以致用。“如此因小学之成功，方能著大学之明效，于是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庶几粲然复明于全国，自不致落于现代教育之后，而复国建国之成功，亦赖于此。”<sup>[33]</sup>鼓励学人回台讲学任教，以提高大专学校学术研究水准。

## 五、小结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时期的国民教育，基本实现了其目标，台湾人认同、发扬中华文化并产生了文化自觉。在此期间，国民教育取得较大发展，在古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国学的推广与普及、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等方面作出了贡献。1968年中华文化复兴初期，台湾“行政院”颁布“九年国民教育实施纲要”，蒋介石指示“加强民族精神教育、生活教育及职业陶冶为中心”<sup>[34]</sup>，强调课程要实现“明了中华文化的渊源与现代生活的关系”与“激发其爱护国家、团结奋斗的精神与观念”<sup>[35]</sup>。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时期的国民教育，提高了国民素质水平和民族自信心，增强了台湾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与传统文化认同，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回归。

文化复兴运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与教育，增强了台湾同胞的祖国大一统意识。以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萧瑜所提出的第三代国民教育说为例，重视国民小学教育，并完善初级、高级、职业教育体系，为台湾培育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将台湾同胞与大陆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论动机如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时期国民教育的推行，一定程度上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使其重新树立起在台湾的文化主体地位。

## 参考文献:

- [1][4][18][21]侨务委员会(编印).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论文集[M]. 台北: 侨务委员会出版. 1967.
- [2]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委员会议工作报告[M]. 台北: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 1985.
- [3]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 台湾省通志[M]. 南投: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 1970.

- [5][6][7][8][16]台(57)中秘字第074号谷凤翔呈.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 馆藏号: 总裁批签 57/0040. 1968-4-8.
- [9]蒋冀骋(点校). 左传[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6.
- [10][13]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印).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法规汇编[M].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出版. 1987.
- [11]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各研究委员会之重要工作项目纲要.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 馆藏号: 总裁批签 57/0004. 1968-1-8.
- [12]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方案(草案).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 馆藏号: 总裁批签 56/0147. 1966-12-27.
- [14][15]何凤娇(编).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资料汇编[M]. 台北“国史馆”印行. 2000.
- [17]台湾省政府公报[N]. 1975年夏字第三十三期.
- [19]秦孝仪(编).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M].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 1984.
- [20]孙科. 如何复兴中华文化[C]. 侨务委员会.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论文集. 台北: 侨务委员会出版. 1967.
- [22]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方案(草案). 馆藏号: 总裁批签 56/0147. 1966-12-27.
- [23]中央日报[N]. 1966-12-26.
- [24]文复会秘书处(编).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报告. 1971-7-27.
- [25]何凤娇(编).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资料汇编[M]. 台北: “国史馆”印行. 2000.
- [26]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重修台湾省通志[M]. 南投: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2005.
- [27][28][29]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印).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法规汇编[M].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出版. 1987.
- [30]秦孝仪. 中华民国文化发展史第四册[M].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1.
- [31]张其昀(编).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M]. 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4.
- [32][33]何凤娇(编).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资料汇编[M]. 台北“国史馆”印行. 2000.
- [34][35]“教育部”国民教育司. 国民小些暂行课程标准正中书局[M]. 台北: 正中书局. 1968.

责任编辑: 刘 强